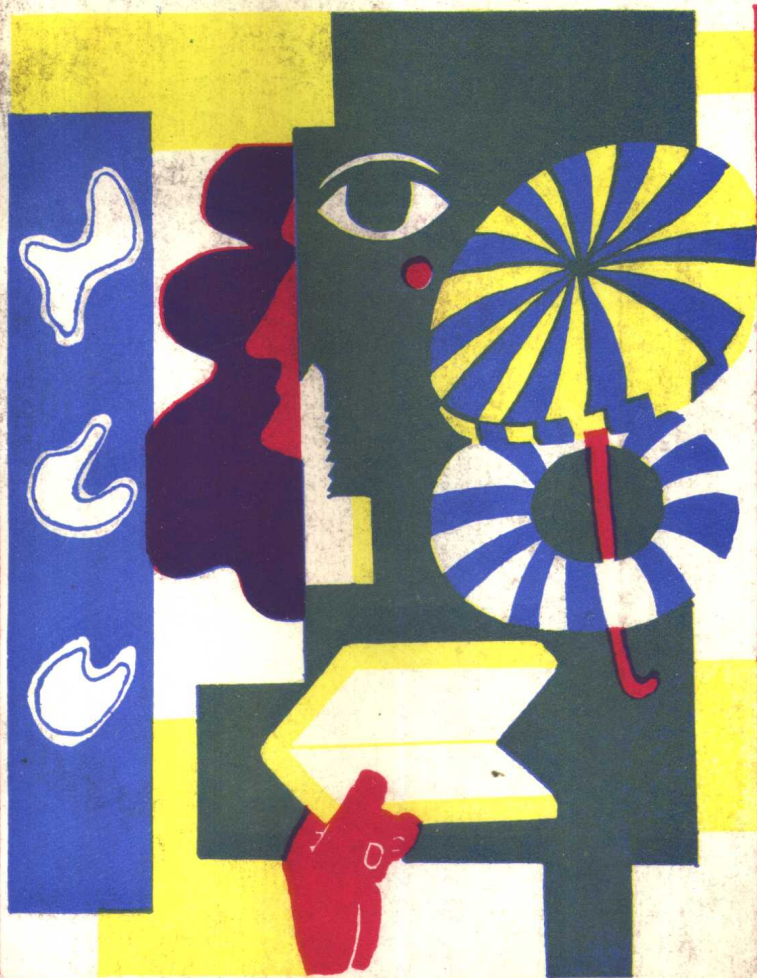


• 达洛卫夫人 • • 到灯塔去 •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

二十世纪外国立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〔英〕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达洛卫夫人

孙梁 苏美 译

到灯塔去

瞿世镜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Virginia Woolf
MRS. DALLOWAY
TO THE LIGHTHOUSE

根据 Harcourt, Brace & World Inc. 1927, 1955 年版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暂定二百种。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，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达洛卫夫人 到灯塔去

〔英〕弗吉尼亚·伍尔夫著

孙 梁 苏 美/瞿世镜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6 字数 306,000

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6,600 册

ISBN 7-5327-0165-4/I·075

定价：4.15 元

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Asheham House,
Rydmall,
Lewes.

14th [1877]

Naturally, we are much worried,
but of good course to birth a
bad regularly into summer, we forgive
We all return to see you at the
break-out, the sheep occasionally come
into the place but that's about all
The trains are faster. 2.15 from
Gusford to Brighton, arriving 3.15
4-14 catch a train arriving 4.15
4.46. or go to London, or
take 3.20 from Victoria. The only
way out is a taxi, or fly, unless you
wait.

I have been sent 20 of these leaflets
by Mr. H. H. H. H.

Y V.W.

作者手迹

论伍尔夫以及《达洛卫夫人》

——代 序

这些年来，谈起意识流，不少人似乎认为，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，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。在西方，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。例如，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里维斯教授(F. R. Leavis)批评弗吉尼亚·伍尔夫(Virginia Woolf, 1882—1941)的作品意义不大，价值不高，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，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；并说，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(The Bloomsbury Group)^①，乃是一群孤芳自赏、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，心胸狭窄，视野不广。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，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“对生活 and 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，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，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”。

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，涉及传统与创新。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，在当年(本世纪20—30年代)，意识流是崭新的、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，完全摆脱传统，反其道而行之。

以上所云，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，但又不尽然。因为，意识

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,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、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;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,以至尖锐的批判性;或许可以说,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,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,而是在一定程度内,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,有时颇为激烈,甚至偏激哩。不过,归根结蒂,伍尔夫之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、自由主义、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揭露与批判伪善的、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、习俗、偏见和理性主义,貌似一针见血,其实浮光掠影而已。

总之,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,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,色泽或浓或淡,个儿或大或小,盘根错节,姿态横生,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。

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,弗吉尼亚·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。譬如,在论文《斜塔》(*The Leaning Tower*)内,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,在一九一四年之前,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(除了戴·赫·劳伦斯),攻读于高等学府,可称“天之骄子”,踞于金塔之顶,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。然而,一九一四年之后,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,作家们再也不能“闭塔自守”,而逐步认识到,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,易言之,他们的家世、财富与教养,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。即使象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,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。

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,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

① 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地名,文化中心区,伍尔夫卜居之处,在不列颠博物院附近。

他们呼吁,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。她强调,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,提高其社会地位。例如,在名著《自己的房间》(*A Room of One's Own*, 1929)中,她主张,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,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。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,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“牛桥”^①的感受。据说,由于她是女人,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。此外,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图书馆内,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,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,岂非不公平之至?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: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,其中所有的人,不论男女或穷富,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。此外,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,让工人成为作家,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,文艺更多样化。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,这些理想近乎“乌托邦”,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。

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,她在作品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、暴露及批判;同时,对于被欺凌、被压抑的“小人物”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。就以《达洛卫夫人》为例,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:“在这本书里,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,可谓文思泉涌。我要描述生与死、理智与疯狂;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,揭示其动态,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……”^②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

① “牛桥”(Oxbridge):此词是拼凑牛津(Oxford)与剑桥(Cambridge)而成的“新词”,含有对老牌大学的讽刺。

② 见伍尔夫《日记》,1922年6月18日;引自昆丁·贝尔作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评传,第2卷,第99页,屈拉特—格拉纳特出版社,1982年。

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：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“大医师”威廉·布雷德肖爵士；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·沃伦·史密斯，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，深受刺激，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，终于自戕。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，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。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，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，乃是室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，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。

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，常用来告诫病人，必须有“平稳感”，即处世要四平八稳、循规蹈矩，切忌与众不同、异想天开，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，始终稳健。对此，作者鞭辟入里地讥讽，“威廉爵士崇拜平稳，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，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；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，严禁其生育，惩罚其绝望的行径，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，直到他们遵从他那‘平稳感’的教诲……”总之，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、制度和秩序，决不可离经叛道，事实上，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。在这种氛围里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，但不肯屈从，不愿随波逐流，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。

关于这一要点，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：当情节的关键（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）达到高潮时，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、尽情欢乐之际，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。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，立即想象，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：“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，而爵士凭他的权力，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，那青年很可能会说：活不下去了。”实际上，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，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。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，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。然而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，世俗的桎梏牢

不可破，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，相反，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；于是只得采取折衷的办法，在热闹的宴会中，悄悄地躲入斗室，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，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。

她性格中独立不羁的一面，也表现在对家庭女教师基尔曼的深恶痛绝，主要因为那阴郁的女人力图转化其学生（达洛卫夫人的女儿伊丽莎白），千方百计企图改变那少女的信仰，强求她皈依基尔曼自己信奉的宗教。关于这一点，作者概括道：“稳健有一个姐妹，不那么笑里藏刀，却更强大、更可怕……她名唤转化，惯于蹂躏弱者的意志，热衷于炫耀自己，强加于人，硬把自己的形象铭刻在众人脸上而得意扬扬。”这种专横的作风使达洛卫夫人打心坎里憎恶，因为她“从来不想转化任何人，只愿每个人保持本来面目”。然而，基尔曼却煞费心机、不择手段地要转化伊丽莎白。这一强烈愿望充分体现在基尔曼带伊丽莎白去百货商店的场景中。那少女在店里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师，委实不耐烦，渴望离去，基尔曼却兀自思量，“倘若我能抓住她，抱紧她，使她绝对服从自己，那死也甘心了。”最后，伊丽莎白忍无可忍，径自奔出店门，把女教师撇在里面。到了街上，少女“感到自由自在，真高兴呵！清新的空气那么爽快，而在百货商店里，简直闷死人呐”。

上述两节乃是这本小说揭露与批判的聚焦点。相形之下，作者以漫画笔触描摹达洛卫家的清客——宫廷侍从休·惠特布霄德，俗不可耐的势利小人——只是轻描淡写而已，但也一语道破其本质：“他没有心肝，没有脑子，徒有英国绅士的仪表与教养罢了。”简括得很，却入木三分。

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——传统与创新，也可用《达

洛卫夫人》为例证。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，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，并且是主体；在当年，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。然而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、抛弃传统；相反，在塑造典型人物，刻画矛盾性格，精心布局，铺叙情节，逐步推向高潮，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，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、强烈的谴责、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，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，甚至可谓一脉相承。

譬如，《达洛卫夫人》的情节仅仅描写这位议员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夏季，在伦敦一天的活动，从清晨离家去为即将举行的宴会买花，直到子夜晚宴散席为止。看来十分简单，却是经过蓄意构思的。全书以女主人公为核心，晚宴为枢纽，突出地塑造两个极端对立的典型，赛普蒂默斯与布雷德肖，同时描绘上、中层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作为衬托。通过所有这些角色的活动（包括内心波动和日常行为）、纠葛与冲突，特别紧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，使各种细节与事件跌宕起伏，步步深化，趋向高潮，戛然而止，却又余音缭绕。总之，在主题、内容和结构上，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，而不象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，或苦心构思情节。

事实上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评论里结合新与旧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。她在有代表性的论著《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》^①中宣称：“小说首先是关于人；”又说，“一切小说都是写人物的，同时也为了描述性格，而不是为了说教或歌颂……”这同“文学即人学”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。作

① 这篇论文(*Mr. Bennett and Mrs. Brown*)原是伍尔夫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剑桥大学宣读的演讲稿，后于一九二八年出版单行本。

为有创见的文艺批评家，伍尔夫并不全盘否定传统，而相当赞赏十八、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，如笛福、奥斯丁、劳伦斯·斯特恩和乔治·艾略特等的作品，尤其赞扬哈代的小说。在评论法国文学时，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散文家蒙田、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，以及倡导意识流的另一巨擘普鲁斯特同样赞美。此外，这位英国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，称托翁为“真正的大师”，“《战争与和平》描写了人类一切经验同感受”；而她和乔伊斯的作品仅仅是“零星的札记”而已。

二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之所以能综合传统与创新，除了其他因素，家庭教养同个人身世起了颇大作用。她出身于书香门第，祖上几代为达官显宦。其父雷斯利·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，崇尚理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家，又是文艺评论家和传记家（曾编纂巨著《国家名人词典》），并且是剑桥大学的“元老”之一。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萨克雷之女，续弦是朱莉亚·德克沃斯，即弗吉尼亚的生母。这位日后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熏陶，她继承了父亲高超的智力、颖异的悟性与洞察力（但逐渐怀疑以至背离老父严峻的道德观念）；同时继承了母亲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本能（尽管还有悲观厌世的一面）。

她父亲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，如小说家哈代、麦瑞迪思、亨利·詹姆斯，美术史家与评论家鲁斯金等，经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。此外，他有大量藏书，因而弗吉尼亚于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，读遍柏拉图、索福克勒斯、普鲁塔克同斯宾诺莎

等所撰文、史、哲经典名著，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础。由于她自幼羸弱，未入学校受正规教育，而是在父亲教导下，以自修为主。这使她在以后的创作及评论中，既摆脱了清规戒律与学究气，又养成了非正统观念，我行我素，随意抒写。

另一方面，她同剑桥大学的渊源很深，因为父、兄曾在那古老的学府里攻读或任教。她正是通过兄长沙佩的介绍，结识了剑桥的不少师生，其中包括李奥纳特·伍尔夫，即她日后的丈夫，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，也是文学批评家。婚后，于一九一七年，夫妇俩创办霍加斯出版社，陆续刊行了当年的“新秀”如小说家爱·摩·福斯特、凯塞琳·曼斯菲尔、史学家与传记家列顿·司屈雷基（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等的作者）以及诗人托·斯·艾略特的作品，对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。不久，勃卢姆斯伯里区的伍尔夫家成为一个小组的中心，除了上述诸人，尚有美术评论家罗杰·弗拉伊（首先评介法国后期印象派的英国人）、画家邓肯·葛兰特、哲学家罗素与经济学家凯恩斯等，均为当时的“新星”。

这个小圈子是影响深远的英国早期先锋派，其特征是独树一帜，情趣隽雅，审美感与鉴赏力极为敏锐，文艺创作标准甚高，学术气氛浓厚，并且蔑视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，在这方面深受剑桥哲学教授G·E·摩尔（中间偏左的不可知论者）的启迪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就在这新旧递嬗的时代、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生活与创作。她一生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，若干短篇小说，一个剧本和一部传记，三百五十多篇文艺评论及随笔，并译过托尔斯泰的谈话录与情书集（1923）。她逝世后，由丈夫和友人整理并出版其日记（1953）、书信（1956）以及自传（1976）。长篇小说内的重要作品是：《达洛卫夫人》（*Mrs. Dalloway*, 1925），

《到灯塔去》(*To the Lighthouse*, 1927),《奥兰多》(*Orlando*, 1928),《波浪》(*The Waves*, 1931)和《岁月》(*The Years*, 1937)。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,最具意识流特色的是《达洛卫夫人》,迄今读者最欣赏的是《到灯塔去》;而在独特的艺术上臻于化境之作则是《波浪》。

伍尔夫撰述的文艺批评起先大都发表于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与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等报刊上,因为她是特约撰稿人。以后结集,题为《普通读者》(*The Common Reader*, 两卷, 1925, 1932)。这是作者自谦,意为这些文章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嗜,任意鉴赏,信笔拈来,并非严肃的论文。其实,这正是女作家评论的特点,独抒己见,挥洒自如,夹叙夹议,机趣横生,娓娓而谈,毫无说教或枯索之嫌。在所有评论中,代表性的力作有四篇,除了上文所引《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》以及《自己的房间》之外,乃是《现代小说》(*Modern Fiction*)与《独木桥式的艺术》(*The Narrow Bridge of Art*)。这几篇和大部分评论,在她去世后,由李奥纳特汇编成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文集》(四卷, 1966—67)。

在女作家三十余年笔耕生涯里,贯串着一出悲剧,使她身心交瘁,创作蒙受损害;即她反复被忧郁症侵袭,屡次濒于精神分裂,终于绝望,投河自尽。^①

实际上,每当伍尔夫完成一部小说,病魔便来纠缠,困扰不堪,几乎精神崩溃,但每次她都竭力挺住,同病魔周旋、搏斗,复原后又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写作。这种献身于艺术的韧性,同乔伊斯晚年濒于失明而坚持创作的毅力足以媲美了。从另一角度来看,也可以说她致力于创作是为了战胜病魔,追求解脱吧。

① 在离伦敦不远的苏赛克斯郡内城镇罗特密尔。

尽管伍尔夫写作时神志清醒，但痼疾的阴影势必在小说与文章内隐现，甚至相当浓重。譬如在《达洛卫夫人》里，当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在晚宴将散席时，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噩耗，立刻觉得自己“很象那陌生的年轻人……多奇怪，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。”同时，她猜准了那青年是跳楼而死的，迫使他寻短见的是布雷德肖之流。所有这些感触与想象，在一定程度内，折射了作者的心境。

小说并非自传，其中人物不等于作者，然而，作者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会以间接而曲折的方式，移植在某些形象及细节内。在这一点上，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影射了女作家的复合性格以及内心冲突。具体地讲来，克拉丽莎代表作者乐生、理智与随俗的本性，特别体现在她同丈夫理查德·达洛卫和情人彼得·沃尔什的“三角”纠葛中；经过不少波折与再三权衡之后，克拉丽莎终于嫁给平庸而可靠的议员达洛卫，舍弃了心地淳厚、耽于幻想而不谙世故的“浪子”沃尔什，尽管未能忘情于他，即使在他浪迹天涯（印度）之时，也念念不忘。

另一方面，赛普蒂默斯则象征女作家内心深处孤傲、高洁和厌世的情绪。事实上，伍尔夫曾在日记中透露，她要“探讨疯狂与自杀的根源，比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。”按这本小说最初的计划，并无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，最后自尽的乃是克拉丽莎；以后，作者改变初衷，增加了那年轻的“疯子”，为了让他体现“狂人的真谛”，而克拉丽莎成为“正常的真理”的化身。其实，前者更真切地映现了作者的深层心理。她还在日记中流露，她曾听见鸟儿用希腊语啁鸣，正如赛普蒂默斯的幻觉。此外，她在第二次精神危机中，也如小说里那狂人的结局，渴望跳楼，一死了之。

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，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。无论在小说或论著内，伍尔夫的文笔时常是即兴的、跳跃式的，似乎心血来潮、一挥而就，或颠来倒去、自相矛盾，某些评述条理不清，论证不够严谨，引语有些失实。固然，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，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。

长期的精神抑郁以至几乎错乱，乃是伍尔夫厌世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当然还有其他原因，尤其是动荡的时代、紊乱的社会以及植根于异化的思潮，也起了很大的反面作用。伍尔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，残酷的烽火使她震惊，尤其是法西斯对伦敦的反复大轰炸，更使她震撼不已，甚至想象希特勒很可能胜利，到那时她只能自戕了。这种阴霾密布的局势，加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冲击，更促使女作家趋向出世和超脱。她深感古老的欧洲文明脆弱不堪，昔日“太阳不落”的帝国如今摇摇欲坠，以及人际隔阂，人生渺茫，而于幻灭中沉沦。在思想上，她曾受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潜意识与“性本恶”等学说颇深的感染，从而助长了孤寂之感和阴郁的心理。

这些心态在伍尔夫的散文内不时流露，她曾在一篇随笔内感叹：“红尘中的幻觉回响着芸芸众生的呻吟……”，“我们对自己的心灵都茫然，更谈不上渗透他人的心灵了……”，“我们在人间孤零零地走一遭，这样倒更惬意呢。”又如，她在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：“生活恰似万丈深渊边上的羊肠小道……”这些话不但透露悲观的心思，并且表明，这位意识流作家惯于剖析深层心态，挖掘自我意识。然而，一味凝视内心，剥茧抽丝般解剖自我，可能会夸大心灵深处的疑虑、惶惑及恐惧，更觉得浮生若梦、万有虚无，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，甚至一团漆黑了。这，也许是意识流作品大都悲观色彩浓郁的一个缘

故吧。

三

时代的脱节同社会的机陞加剧了伍尔夫避世的倾向，另一方面，在创作和评论的领域内，却又是刺激她力求创新的动力。为什么要革新？简言之，时代变了。伍尔夫认为：“显然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，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点，周围一切都变了，人本身也在变。”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包括文化、政治、宗教意识同人际关系，等等，都在剧烈变化；知识分子（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）的处境不再象以前那样稳定，而是在纷纭的生活漩涡中，特别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。^①对这种新局面，伍尔夫曾阐述：“所有的人际关系，诸如父子、夫妇、主仆之间的关系，都变了。随着这种变化，宗教信仰、人的行为、政治与文艺等也必然要变。我们姑且说，这种变更从一九一〇年开始。”^②她还申述：“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，人性开始变了。”变得更卑琐、更丑恶：“如今的人，无论英国人、德国人或法国人，看起来都那么蠢，那么丑。”^③此外，由于现代生活变得更乱，节奏加快，人的意识也流动得更快，变幻多端，捉摸不定。

上述各种嬗变必然促使审美标准以及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地变革。新时代的作家应超越旧时代的前辈，而肩负创新的使命。至于如何划分新旧时代，伍尔夫明确地讲：“我建议，把爱

① 参看《斜塔》。

② 引自《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》。

③ 引自《自己的房间》。